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二卷】 主编·吕晴飞

此系真跡台案蒼蔚以是中人
瑞水通光賸得之持以相示為題

數語已未七月日卯上旅人十標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二卷〕韩愈〔下〕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 韩愈散文鉴赏 (下)

答吕璠山人书·····	(221)
送孟东野序·····	(225)
送许郢州序·····	(233)
送齐暲下第序·····	(238)
送李愿归盘谷序·····	(244)
送董邵南序·····	(249)
赠崔复州序·····	(254)
送浮屠文畅师序·····	(258)
送廖道士序·····	(265)
送王秀才序·····	(269)
送王秀才序·····	(274)
荆潭唱和诗序·····	(278)
送幽州李端公序·····	(282)
送区册序·····	(285)
送高闲上人序·····	(288)
送殷员外序·····	(294)
送杨少尹序·····	(298)
送石处士序·····	(302)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307)

送郑尚书序·····	(312)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316)
石鼎联句诗序·····	(322)
祭田横墓文·····	(328)
欧阳生哀辞·····	(331)
祭十二郎文·····	(338)
乌氏庙碑铭·····	(346)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	(351)
曹成王碑·····	(357)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366)
贞曜先生墓志铭·····	(372)
平淮西碑·····	(376)
南海神庙碑·····	(385)
柳州罗池庙碑·····	(391)
黄陵庙碑·····	(396)
柳子厚墓志铭·····	(401)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408)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411)
毛颖传·····	(415)
送穷文·····	(422)
鳄鱼文·····	(429)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434)
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439)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444)
复仇状·····	(447)
为裴相公让官表·····	(453)
论佛骨表·····	(460)

目 录

潮州刺史谢上表.....	(468)
李实.....	(473)
宫市.....	(476)
五坊小儿	(480)

【答吕翬山人书】

韩 愈

愈白：惠书责以不能如信陵执轡者，夫信陵战国公子，欲以取士声势倾天下而然耳。如仆者，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以世事。又自周后文弊，百子为书，各自名家，乱圣人之宗，后生习传，杂而不贯，故设问以观吾子。其已成熟乎，将以为友也。其未成熟乎，将以讲去其非而趋是耳。不如六国公子有市于道者也。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务欲进足下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以争救之耳，非谓当今公卿间无足下辈文学知识也。不得以信陵比。

然足下衣破衣，系麻鞋，率然叩吾门。吾待足下，虽未尽宾主之道，不可谓无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益寡。乃遂能责

不足于我，此真仆所汲汲求者。议虽未中节，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将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听仆之所为，少安无躁。愈顿首。

韩愈的《答吕翊山人书》是一篇书信体说理散文。写作时间无考。根据文章内容，世人多推测是韩愈在他的仕途顺利时期，即任刑部侍郎（唐宪宗元和十三、四年）或吏部侍郎（唐穆宗长庆二、三年）时的作品。

吕翊山人，翊，同医；隐居山林，不求功名富贵的人称作山人，在本名后面加上“山人”用以称呼亦盛起于唐代。吕翊其人，生平事迹无考。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吕翊曾要求韩愈引荐未果，写信加以责备，于是韩愈即写下了这封回信，给予答复。韩愈一向重视奖掖后进，并且一贯在这方面持有严正的观点。本文中他针对吕翊说他“不能如信陵君执辔”的责备，顺势生发，侃侃阐述了自己对交结贤士、推荐人才之事的态度。同时，也对吕翊以诚相见。文章气势凌厉而辞意醇厚婉转，是一篇难得的情意恳切、说理透彻的妙文。

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是“惠书责以不能如信陵执辔者。”惠书是对对方来信客气的说法。信陵，信陵君，名无忌，战国时期魏国的公子，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被并称为战国时四公子。执辔，指握着马缰。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记载，魏国有个隐士侯嬴，当时是魏国都城大梁夷门的守门人。信陵君备好马车去请他，侯嬴身着破衣，

毫不客气地坐在信陵君座位的上首，以观察信陵君的态度如何，信陵握着马缰，态度益加谦恭。吕翬在来信中，指责韩愈不能象信陵君为侯嬴执辔那样地接待他。于是韩愈在文中首先表明，自己尊信的是孔子及儒家“圣人之道”，接待象你吕翬这样没经过什么磨练（“恐未砉磨以世事”）的后生，目的也是为了共同讲习明道，以正“圣人之宗”，而不是象信陵君那样，想用交结贤士的名声、声势令天下人倾倒（“欲以取士声势倾天下而然耳”）。接着作者尖锐指出当时靠巧于辞令，甚至靠公卿大夫的家世门第不用考试即可做官的入仕途径，使天下的人都学会了一味顺随，善于迎合皇帝之意。风气日益衰败颓坏。声明自己要推荐敢于舍弃个人性命、不顾自身利害得失的人到朝廷中去（“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以“争救”日入于衰坏”的朝政。文章在最后，直率明确地告诉吕翬，他对作者的责备“未中节”，说的不对。同时，又称赞了他“不肯阿曲以事人”的品行，并且表示了接纳，说吕翬正是自己急需要找的人。要对他进行三沐三熏的接待。表现了作者真正“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心情及风采。

历来为自己辩驳的文章不太好做——不是失之于愤慨尖刻，便是间或会显出软弱，或不够周密。韩愈这篇为个人所做的辩驳却有理有节，滴水不漏。这全赖于他对事象本质的敏锐把握和本人开阖自如、奇纵变幻的文笔。例如韩愈面对吕翬来信中的指责，首先没有因为受到冒犯而恼怒，而是看到：吕翬的本意是好的，当初来找他是怀着朴实美好的愿望（“有朴茂之美意”），只是未经过世事磨炼罢了。其次对方信中将他与素有广交贤士美名的信陵君相

比，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交结朋友的意愿与信陵本不相同，所以不能比，也用不着比。“不得与信陵君比”一句说得斩钉截铁。立足于这两点，他对吕翬回答的是既婉转又率直，真诚地赞扬、鼓励他的长处，委婉但又决不回避地指出其议论的偏颇，同时又给予温厚的告诫。他对自己的观点行为则毫不含糊地一一清晰列举，不显得过激而有炫耀之嫌，也绝不讳言含混。实际上纵观全文，他几乎无一不是在阐述见解，又几乎无不在对答吕翬，同时又在为自己辩白。他手中那支笔纵横恣肆、变化随意，真可谓笔到意随，处处妥贴圆满。例如文章中将吕翬排入“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欲予推荐之列，本是对对方很高的赞美和评价，但作者又紧接着指出，并不是说现在的公卿大夫中就没有与你具有同样文章、学问、识见水平的人，令其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好评和提醒都合情入理，绝不使文字显得过分。又如最末一段说吕翬率然前来，自谓接待并不失礼。你吕翬行遍天下，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接待该属少有。文章到此似有见怪之意，然而作者随即笔势陡转，“乃遂能责不足于我，此真仆所汲汲求者。”这样对待你你还能指摘我的不足，可见你的耿直和不肯屈己迎逢于人（“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这样既否定了对方关于接待不周的评语，又肯定了吕翬的根本优点，更再次展露了自己开阔的胸怀和过人的识见，这般笔墨可当得一个“奇”字，令人叹绝。全文尽管多有此类笔势突兀而起之处，却全篇不滞不隔，分层次处亦转捩无迹，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运笔功力。

(李少群)

【送孟东野序】

韩 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效，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

《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存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予天者以解之。

这是一篇“赠序”，与“书序”不同。赠序发端于

晋，盛行于唐宋，它是由诗序演变而来。古人在亲朋故旧临别之际，常设宴饯别，饮酒赋诗，并由某人为这些诗作序，说明有关情况。这种诗序和一般的书序性质相近。后来，并无诗歌唱和，只是写一篇文章送别，这就是赠序了。赠序既然是赠人之作，其内容必须从对象的具体情况出发，除此之外，写作是非常自由的，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挥洒自如，不拘一格。韩愈是赠序写作的高手，《韩昌黎文集》收有赠序三十余篇，《送孟东野序》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

孟东野（751—814），名郊，中唐著名诗人。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始中进士，五十岁才谋得一个小小的县尉，以后也一直不得志，可谓穷愁潦倒一生。韩愈早年仕途也很坎坷，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大致相同的遭遇，加上志趣相投，使两人成了忘年之交。他们在文字上交往颇多，这篇赠序就是送孟郊赴溧阳县尉时所作，一方面表达了为友人鸣不平的愤懑之情，另一方面又用深刻的哲理来劝慰和激励孟郊，希望他摆脱愁苦和烦闷，振作精神，做时代的善鸣者。

这是一篇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又蒙受了许多误解的作品。它提出了一个精警的命题“物不得其平则鸣”，由这个命题演变而成的成语“不平则鸣”，千百年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篇赠序蕴含丰富，思路复杂，有些语句又比较委婉含蓄，人们难以揣摩本意，探其幽微，以致造成许多误解，影响了对它的公正评价。下面就想针对这些误解，谈谈我们的看法。

有些评论家认为，“不得其平则鸣”只是指被压抑者

自鸣其不幸，不能包括圣贤之鸣与鸣国家之盛者，并由此得出结论，这篇赠序的主旨与例证不合。（见何焯《义门读书记》，周振甫先生在《古文鉴赏辞典》中也有同样看法。）

很难设想，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居然会写出主旨与例证明显不合的文章！这很可能是评论家们以今度古，把“不平则鸣”这个成语的今义强加到韩愈的头上了。

我们认为，韩愈所提的“不得其平则鸣”是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命题，含有深刻的哲理。所谓不平，就是不平衡，不平静。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如此。就情感而言，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因为任何情感都是内心不平静的一种表现。韩愈在文章中实际上已表述得十分明确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所谓“不得已”，就是指人受到外界的影响有所感触，极不平静，不得不倾吐出来。所以，失意者自鸣其不幸固然是不平之鸣，得意者鸣国家之盛也是不平之鸣。总之，“凡出乎口而为声者”，都是不平之鸣。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韩愈的原意；只有这样理解，才会觉得文章并无扞格之处，其论点和论据是和谐统一的；也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客观实际。就文学而言，任何时代既有得意者的欢歌，也有失意者的悲鸣，即使是失意者，也不可能一味地愤愤不平，他们也会有欢歌笑语。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也不能把一切歌颂的、闲适的、平和的文学一概斥之为毫无价值的伪文学，何况昌明

的盛世呢！

有人说，作者写作此序的目的是劝孟东野“知其为天所假，自当听天所命”（见林云铭《韩文起》，转引自《韩愈资料汇编》九九〇页）。

不错，赠序的最后一段的确是说了“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一类的话，这的确反映了作者的天命观。但揣摩全文，作者的真正用意似乎并不在于劝友人用消极的天命观来麻醉自己。如果仅止于此，就用不着一开始就发那么一通“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议论了，也用不着列举那么多的历史事实来证明“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观点了。全文的意思无非是说，个人的幸与不幸是由国家的盛衰、政治的清浊、当权者对人才的爱惜与否等因素所决定（作者不便直言，只好笼统地假托于“天”），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但幸与不幸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善鸣者。而不幸者由于对生活的感受更深，更具有真情实感，其作品往往更能撼人心魄而流传千古，政治上的失意很可能带来诗歌创作上的丰收，因此劝孟郊不要太看重个人的沉浮升迁，应该摆脱苦闷，振作精神，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懈地努力，争取成为时代的最善鸣者。全文的议论针对孟郊善诗的特点，有的放矢，入情入理，既表示了对友人的充分理解，又寄托了作者的深切同情，但更多是思想上的开导，精神上的激励。

“拉杂散漫，不可捉摸”，这是对此文的又一种误解。（见过珙《古文评注》评语，转引自《韩愈资料汇编》一一五八页）

这篇文章凭空发论，转接突兀，驰骋古今变幻莫测，乍看是有点眼花缭乱，难以捉摸，但是只要把握了它的结构特点，就会觉得脉络清晰，条理井然，形散神不散。这篇文章采取的是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连锁式结构。全文紧扣“鸣”字着笔，先立“不得其平则鸣”作为论述的出发点，立论的前提。同是不平之鸣，但有善与不善之别，所以第二段把议论引申一步，转入对“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论证。音乐、天时的“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只是陪衬，重点还是为了说明人的不平之鸣，“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至此，作者不惜笔墨，从古到今，列举历代的善鸣者，其中有幸者，也有不幸者，而其目的又在于陪衬出“存而在下”的善鸣者——孟郊。最后落脚到“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论述中，多方取譬，反复阐述，纵横恣肆，变幻莫测，然脉络清晰，条分缕析，似无拉杂散漫、不可捉摸之处。或许有人要说，此序既为东野而作，以古证今，落到孟郊处已可收束，何以又陪出李翱、张籍？答曰：李、张与孟郊，才气相当，命运相似，又同为作者好友，以今陪今，孟郊将会倍感亲切，岂不是更能减少一些寂寞之感？不知东野以为然否？

“征引太繁，颇伤冗蔓”，这是又一种议论。（见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转引自《韩愈资料汇编》一四八九页）

所谓“征引太繁”显然是指所列举的历代善鸣者太多，太滥。繁乎？冗蔓乎？不能抽象而论，得看这些例证是否有助于突出中心思想，是否有助于实现作者的写作意

图。

在列举的大量历史人物中，有盛世的，也有衰世、乱世的；有以学术思想鸣的，也有以文章诗歌鸣的；有鸣国家之盛的，也有自鸣其不幸的。这就说明，任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善鸣者，即代表作家；同时也说明，不管是当权的得意者，还是不得志的失意者，只要能以自己的作品体现时代精神，都可以成为自己时代的代表而流传千古。以此来激励以诗采自鸣其不幸的孟郊，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作者在列举的大量历史人物中，从排列的次序上，词语的选择上，句式的变化上，画龙点睛的评议上，又特别突出了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等人，其目的就是要说明，作为一个善鸣者，必须具有各自的思想、真实的内容和出色的文彩。韩愈在哲学思想上是尊儒重道、觐排异端的，在文学思想上是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的。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以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因此，他突出孔子及其儒家学派而贬抑魏晋以来的作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撇开“道”的具体内容不说，他强调文章要有正确的思想和充实的内容，则完全是对的。庄周是儒家的对立派，但他对社会现实有很深的不满，其文章又想象丰富，诗意浓郁，论辩雄健，文辞瑰丽。作为文学家的韩愈，能摈弃学派的偏见，对其“荒唐之辞”（即汪洋恣肆的文辞）特别欣赏，将他从以“术”鸣的诸子中挑出来，使之与孔子、屈原并列，这显然是一个创见。韩愈虽然认为失意者、得意者之鸣皆属不平之鸣，都可以成为善鸣者，但他也深深知道“欢

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因为失意者之鸣往往更具有真情实感。所以，他特别推重忧国忧民、把个人的忧患与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屈原，特别推重“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发愤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韩愈正是把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含蓄评价中，从而给友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也寄托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希望友人在创作上更加孜孜以求，“不懈而及于古”，成为自己时代的最善鸣者。这种含而不露的写法，是由被送者，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善于以其诗鸣的友人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正是韩愈笔法的高明之处。

由此可见，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大量例证，不仅很好地起到了陪衬主体的作用，对突出中心思想、实现写作意图，也是非常必要的，完全不是什么“征引太繁，颇伤冗蔓”。

澄清上述误解，就更能看出这不是一般的应酬文字，而是一篇立论正确、内涵丰富、论证严密、气势磅礴的佳作。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篇文章已臻于炉火纯青、完美无缺的境界，不足之处也还是有的。如对魏晋以来的作者全盘否定，就未免失之偏颇；把元结置于李白、杜甫之前，无论从时序上还是从重要性上来说都是不当的；说孟郊“始以其诗鸣”，尽管林纾说用了“急救之法”以补救，也难以自圆其说。但这一切毕竟是微疵，无损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名篇地位，也无损于它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应雨田）